

Rubbing of Liu Gongquan's Diamond Sutra Discovered at Dunhuang

敦煌本柳公权书《金刚经》拓本研究

毛秋瑾 Mao Qiujin

内容提要：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三种唐碑拓本受到广泛关注。其中题为柳公权所书《金刚经》拓本最为完整，却引起学者们的争议。本文结合文献史料及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从拓本缺字现象及书法风格两方面来论证这一碑拓为后人伪托之作。

关键词：

敦煌 柳公权 金刚经 拓本 伪作

Abstract: Among the rubbings of three Tang dynasty tablets discovered in the Library Cave at Dunhuang, the *Diamond Sutra* attributed to Liu Gongquan is the only complete one but has been much disputed by scholars. Relying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studies missing characters in the rubbing and its calligraphic style and argues that the *Diamond Sutra* is a forgery.

Key Words: Dunhuang; Liu Gongquan; *Diamond Sutra*; rubbing; forgery

敦煌藏经洞发现有三种唐碑的拓本，分别是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书《温泉铭》拓本、贞观五年（631年）欧阳询书《化度寺邕禅师塔铭》拓本（P.4510+S.5791）及长庆四年（824年）柳公权书《金刚经》拓本（P.4503）。在这三种碑拓中，《金刚经》拓本是唯一完整的一种，然而也是引起最大争议的一种，学者们对于这一拓本原石是否为柳公权所书有不同意见。本文结合文献记载及学者们的论述，对敦煌所出《金刚经》拓本展开研究，论证其为后人伪托之作。

一 史籍记载的柳公权书法及《金刚经》碑拓

柳公权（778—865）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人，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根据史籍记载，他从小就喜欢学习，十二岁就能作辞作赋。元和初年中进士，初仕为秘书省校书郎。“元和”为唐宪宗李纯的年号，元和元年是公元806年，此时柳公权29岁。他在青壮年时就以书法闻名。《旧唐书·柳公权传》记载：

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见，谓公权曰：“我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迁右补阙、司封员外郎。^[1]

唐穆宗即位是公元 820 年,此时柳公权 43 岁,正值壮年。在此之前,佛寺中就能见到他的书迹,可知他的书法在宪宗朝就为世人认可。

柳公权在唐穆宗(820—824 在位)、敬宗(824—826 在位)、文宗(827—840 在位)三朝都担任宫中的侍书学士。他在穆宗朝有“心正笔正”之谏,后世传为美谈。唐文宗更是推崇他的诗文和书法,曾命他将诗句题写在宫殿的墙壁上,每字方圆五寸,文宗看了以后赞叹说,连钟繇、王羲之再生也超不过他。唐宣宗(847—859 在位)继位后,升他为少师,柳公权进宫答谢,宣宗召他上殿,让他当面书写三幅字,军容使西门季玄替他捧砚台,枢密使崔巨源替他过笔。一幅写的是正楷十个字:“卫夫人传笔法于王右军”;一幅是行书十一个字:“永禅师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幅是草书八个字:“谓语助者焉哉乎也”。宣宗赏赐给他锦缎、瓶盘等银器,并命令他亲自书写答谢表,不拘楷书、行书,宣宗对他的谢表,特别珍惜^[2]。

两唐书中记载柳公权最初学习王羲之的书法,又广泛浏览学习近世书家的笔迹,形成自己遒劲而妩媚的书风。他的书法既取法于魏晋,又受到初唐盛唐书家的影响,自成一家。柳公权所书写的《金刚经》,更是烜赫名迹。两唐书中均记载长安西明寺的《金刚经》为柳公权所书,兼收钟繇、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等人的笔法,是他的得意之作^[3]。且《旧唐书》中明确指出为《金刚经碑》,因而这是他本传中唯一提到的碑版作品,应当是他在世时影响最大的代表作品之一。有关柳书《金刚经》的著录较多,下文列举几例。

宋代赵明诚(1081—1129)《金石录》卷十有两条关于柳公权书《金刚经》的记载,一为第 1860 条:“《唐金刚经》,柳公权正书,会昌四年(844 年)四月。”一为第 1909 条:“《唐西明寺金刚经》,柳公权正书,大中十三年(859 年)六月。”^[4]

宋代董道(生卒年不详,活动于北宋政和[1111—1117]至南宋建炎[1127—1130]年间)所著《广川书跋》卷八《金刚经》条云:“此经本书于西明寺,后亦屡改矣。经石幸存,不坠兵火。柳玘谓备有钟、王、欧、虞、褚、陆之体。今考其书,诚为绝艺,尤可贵也。”^[5]柳玘是柳公权兄长柳公绰的孙子。这条记载说明西明寺的《金刚经》经过屡次变动(大概指石碑位置的变动),但并未毁于战火,在北宋、南宋之际尚存。

南宋佚名作者编纂的《宝刻类编》卷四记有柳公权书迹共七十六件。其中《金刚经》有两件,其一为郑□题额、会昌四年(844 年)四月书,其二为安国寺模西明寺《金刚经》、大中十三年(859 年)六月书,两种碑石均保存在京兆长安^[6]。上述记载说明柳公权书写的《金刚经》碑石不止一处,南宋时西明寺《金刚经》已经不存,只存有安国寺的模刻。西明寺的《金刚经》为烜赫名迹,若是存世,《宝刻类编》的作者不可能不记录。

明代于奕正(生卒年不详,活动于嘉靖年间)《天下金石志》记载有柳公权的两种《金刚经》:“《褒禅寺金刚经》在鄞县”,“《兴唐寺金刚经》,郑虔题额,在咸阳”^[7]。第一种在浙江鄞县,可能根据柳书翻刻,也有可能是后人伪托。第二种记为“郑虔题额”,郑虔(691—759)在柳公权出生以前就已去世,应是后人根据《宝刻类编》的记载而作的附会,碑石恐亦是翻刻或伪托柳书之作。

宋代诸书家对柳公权的书法极为推崇,也深受其影响。明末清初孙承泽(1593—1676)所著《庚子消夏记》卷七云:“柳公名墨行世者,李西台爱《柳尊师志》,欧阳公爱《高重碑》,蔡君谟爱《阴符序》,米元章爱《金刚经》,薛道祖爱《崔陲碑》。”^[8]这

是说宋代李建中、欧阳修、蔡襄、米芾、薛绍彭都喜爱柳公权的某一碑刻，各得其所。其中米芾所喜爱的正是《金刚经》。孙承泽还曾见过宋代的《金刚经》拓本，据《庚子消夏记》卷七称：“柳迹在京师者有宋拓《金刚经》，贾似道藏本，在李梅公寓。”^[9]此拓本现已难觅踪迹。

二 敦煌本《金刚经》拓本及相关研究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金刚经》拓本，与上述诸种碑拓找不到对应关系。这一拓本共有 468 行，末尾有 5 行题记，内容为：“长庆四年（824 年）四月六日翰林侍书学士、朝议郎、行右补阙、上轻车都尉、赐绯鱼袋柳公权，为右街僧录准公书。强演、邵建和刻。”^[10]

这一拓本最早刊布于 1916 年罗振玉（1866—1940）辑印之《墨林星凤》一书，他根据同为藏经洞发现的唐太宗《温泉铭》拓本上题有高宗永徽四年（653 年）的题记而将《金刚经》拓本也定为唐拓^[11]。早在 1909 年左右，罗氏已在《鸣沙山石室秘录》一书中记录了这一拓本，其题跋为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于明治四十三年（1910 年）所转录^[12]。

与罗振玉同时代的欧阳辅（1861—1939）却认为此拓是伪作。他谈到了宋人著录的两种柳书《金刚经》，随后云：“今石本末署长庆四年，则更在先，然宋元以来未有言及者。而其字鄙俗，不似柳之开展，大类梦英、正蒙辈所为。且其后纪年、署名四行字大而密，不与经相等，亦似后添。此经宋以前石刻最多，皆不署名。其字学欧、学褚者众，学柳者则宋人耳。石室本殆亦宋人刻，无甚剥落。作伪者以其书貌似柳，故增柳名于后。即使此本果出自石室，亦宋人伪托也。”^[13]

《中国书法全集》27《柳公权卷》亦将此拓定为伪作。此卷主编吴鸿清在作品考释中引用了前述两位学者的观点，并评述道：“此拓本出自敦煌藏经洞确然无疑。然该洞所藏文物上起魏晋，下迄北宋咸平五年（1002 年）。罗拓本玉以《温泉铭》连带及柳书《金刚经》为唐拓，似证据不足。欧阳辅的怀疑有一定道理。当然，此拓未见宋人著录亦不足以说明是伪作。宋人未见而今世出土之古碑甚多。1986 年于陕西西安（即唐之长安）出土之柳公权书《大唐回元观钟楼铭并序》，宋人亦未著录，然确为柳书。《大唐回元观钟楼铭并序》（下简称《钟楼铭》）书于开成元年（836 年），晚于此拓十二年，早于柳公权的代表作《玄秘塔碑》（会昌元年刻）五年。如果将三碑加以比较，确可证《金刚经》为伪托者。”^[14]随后，他指出了书法上存在的两处疑点：一是《钟楼铭》结体有褚字、欧字、钟繇体等多种面貌，《金刚经》早于《钟楼铭》十二年，其书法结体却已具有成熟的柳体特征，这种现象不可能出现；二是《金刚经》笔法圆润而骨力不足，与《玄秘塔》有较大的差异，且捺笔的燕尾时时可见，这是柳书小楷中不曾出现的，应是书者刻意模仿《玄秘塔》所致。

饶宗颐教授在《法藏敦煌书苑精华》第一册《拓本碎金》中收录了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这三种碑拓，并进行了详细考证。他对《金刚经》并未疑伪，认为题记中出现的“准公”即僧中总管灵准，他“在长庆间僧侣之首长地位甚隆，柳为书《金刚经》，故以上石”^[15]。饶教授还考证了刻碑人强演、邵建和的身份。

朱关田在《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第五章“晚唐书法”中专门论及柳公权，他将敦煌所出《金刚经》与《玄秘塔碑》《神策军碑》及《钟楼铭》相提并论，将这四通碑

刻作为柳公权存世书迹中著名且具代表性者^[16]。

近见倪文东《柳公权及其书法艺术论》一文，从柳公权所处的晚唐历史文化背景入手，对柳体楷书产生的时代背景，书风特点、创作分期及对后世书风的影响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研究。文中认为《金刚经》为后人伪托^[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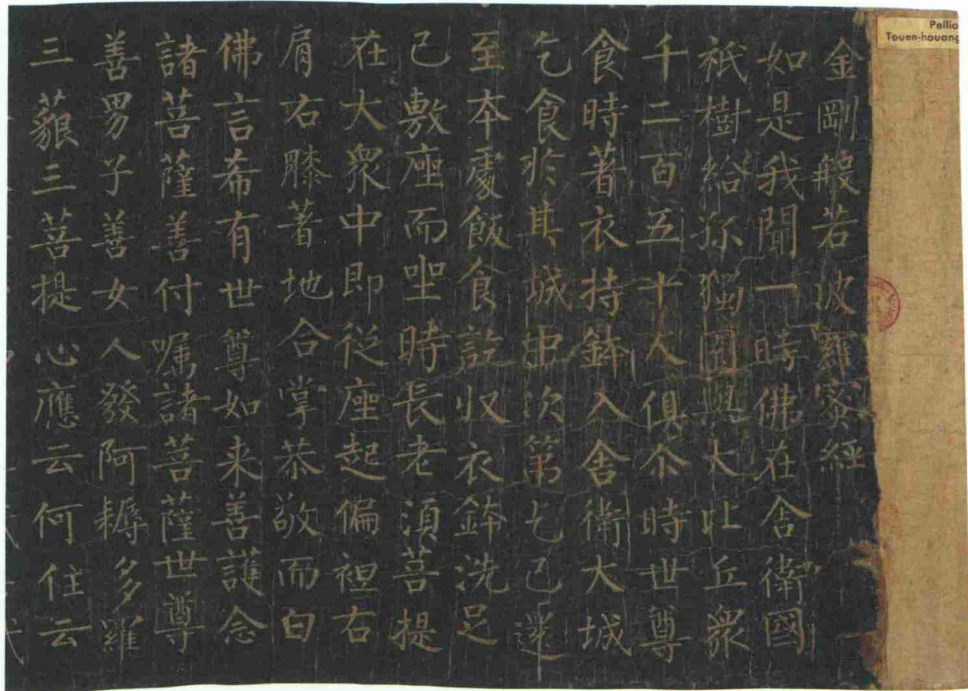
网上亦可见到书学者的讨论。题名“温泉”的新浪博客在2012年9月1日发表博文《〈金刚经〉是否伪作之我见》，从书法风格、笔画特征、署名与经文书风的差异、缺字现象等方面提出了五点疑虑，认为《金刚经》是伪作^[18]。

三 敦煌本《金刚经》拓本之我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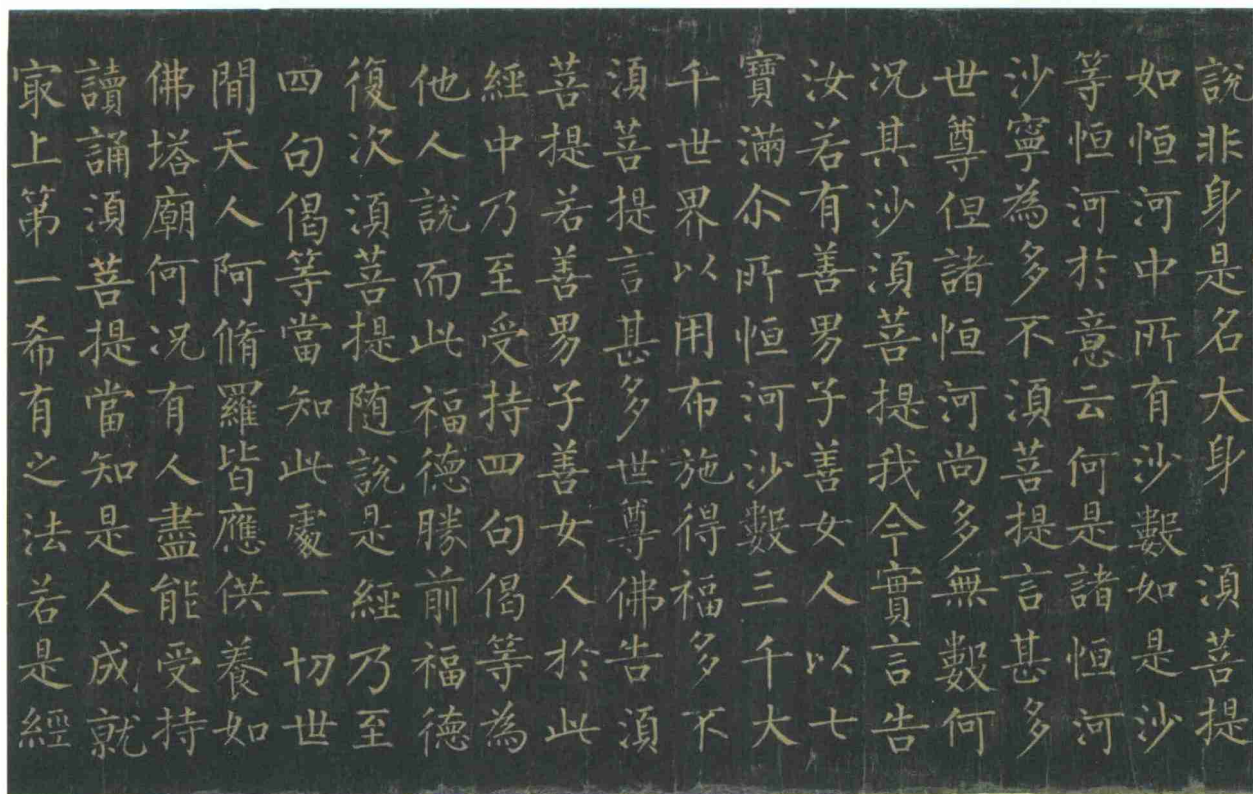
笔者仔细揣摩了《金刚经》拓本的书法（图一一三），并将其与《钟楼铭》（图四）、《玄秘塔碑》《神策军碑》进行了比对，再综合以上诸位学者的观点，认为《金刚经》拓本应是后人伪托的柳公权之作。理由如下：

第一，《金刚经》拓本缺字现象严重，偶有文字颠倒、错讹之处。这部《金刚经》抄写的是鸠摩罗什的译本，正文连同首题、尾题及题记在内共有468行，每行11字。现将脱漏、颠倒、错字处列明如下：

- 第14行：第7—10字“应云何住”应为“云何应住”；
- 第105行：第6字后缺“不”字，“而实无来”应为“而实无不来”；
- 第114行：第2字后缺“世尊”2字；
- 第121行：第7字后缺“不也”2字；
- 第159行：第4字后缺“是名般若波罗蜜”7字；
- 第168行：第10字后缺“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11字；



图一 《金刚经》拓本(P.4503)卷首



图二 《金剛經》拓本 (P.4503) 卷中

第 199 行 : 第 4 字后缺“是名忍辱波罗蜜”7 字 ;

第 278 行 : 第 2 字后缺“心”字 ;

第 284 行 : 第 10 字后缺“心”字 ;

第 293 行 : 第 11 字后缺“者”字 ;

第 314 行 : 第 4 字后缺“实”字 ;

第 332 行 : 第 7 字后缺“如”字 ;

第 336 行 : 第 1 字后缺“沙”字 ;

第 353 行 : 第 1 字后缺“具足”2 字 ;

第 365 行 : 第 3 字后缺一段文字, 内容是 :
“尔时, 慧命须菩提白佛言 : 世尊, 颇有众生,
于未来世闻说是法, 生信心不?’ 佛言 : 须
菩提, 彼非众生, 非不众生。何以故? 须菩提,
众生、众生者, 如来说非众生, 是名众生。”
共 62 字 ;

第 367 行 : 第 5 字后缺“佛言”2 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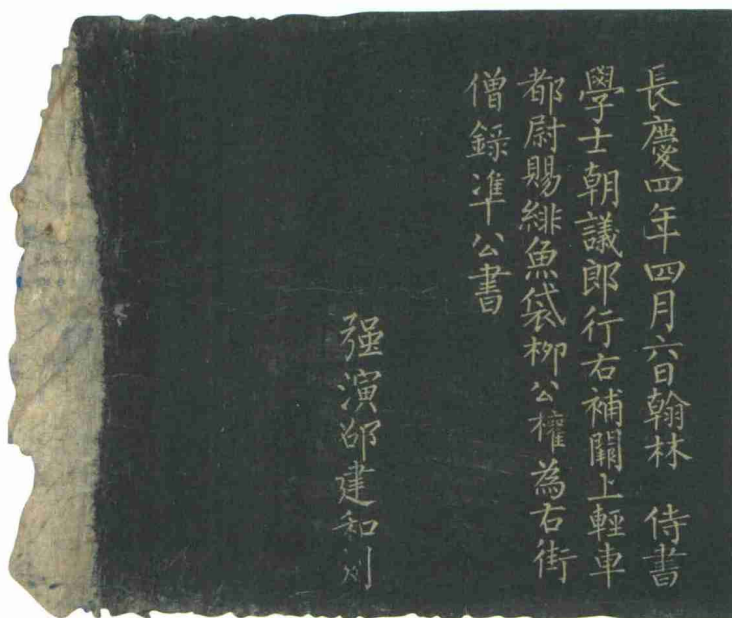
第 381 行 : 第 5 字后缺“读诵”2 字 ;

第 397 行 : 第 3 字“则”应为“即”字 ;

第 409 行 : 第 3 字后缺“心”字 ;

第 411 行 : 第 4 字后缺“心”字 ;

第 432 行 : 第 3 字“则”应为“即”字 ;



图三 《金剛經》拓本 (P.4503) 卷末

第 434 行 : 第 8 字“ 则 ” 应为“ 即 ” 字 ;

第 440 行 : 第 5 字后缺“ 不也 ” 2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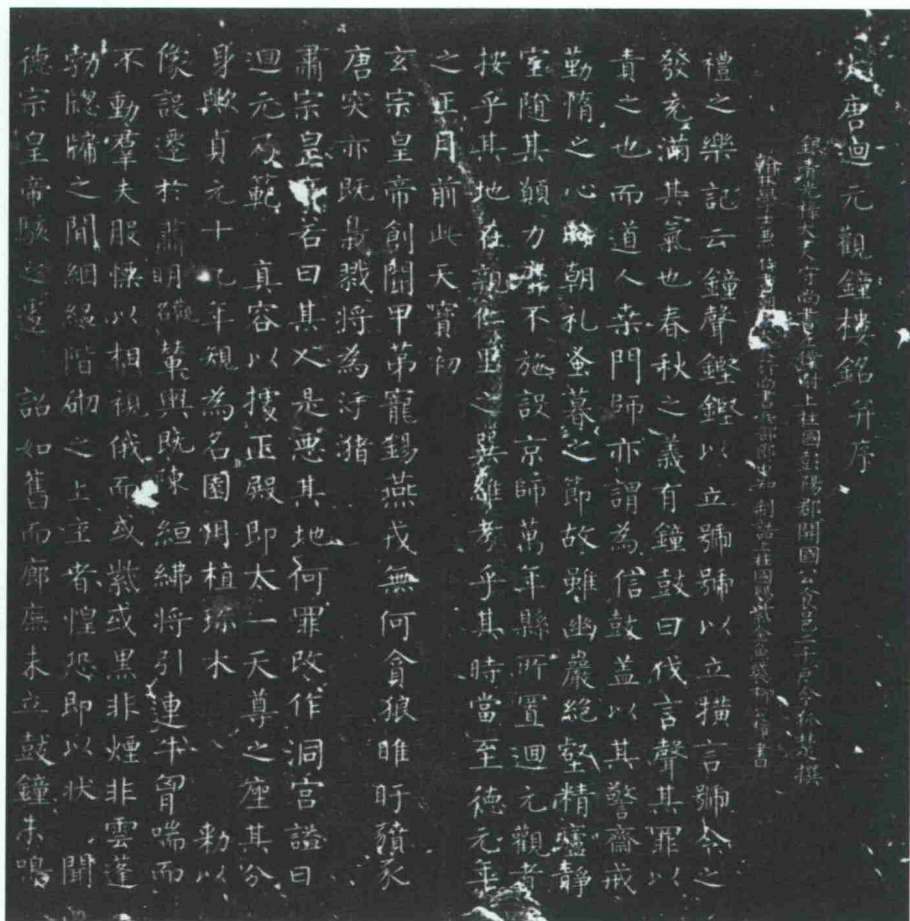
上列出现问题的地方共有 23 处。柳公权为晚唐最著名的书家,且史书记载他直言敢谏,应是性格端正谨严之人。他所书写的碑帖中有错字的现象,但几乎没有少字的现象。这一拓本缺字现象如此严重,不符合柳公权做事的风格。

第二,《金刚经》拓本的笔法、结体与书法风格值得怀疑。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金刚经》已是成熟的柳体风格,字的结体与《玄秘塔碑》接近,而较之晚十二年的《钟楼铭》结体却有褚字、欧字、钟繇体等多种面貌。也就是说,书法家在形成自己的风格特征后却还在模拟古人,以集字的方法进行创作,这种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况且两唐书本传中特别强调西明寺的《金刚经》兼收诸家笔法体势,是他的得意之作。朱关田认为“是评盖出于名教,有所夸饰”^[19],笔者不能认同。柳体书法为集大成者,以《钟楼铭》书法观之,柳公权在 59 岁时还处在向历代书家学习、以笔下能备有诸家之体而引以为得意的阶段。他个人的风格面貌在 60 岁以后才趋于成熟。西明寺前的《金刚经》应是他在集古阶段的代表作,从中应能看到前辈书家的笔法体势,两唐书的记载并无夸饰之处。另外,柳公权书法以“柳骨”著称,史书中以“体势劲媚”加以形容。《金刚经》的书法妩媚圆润有之,笔力遒劲却少了几分。而无论是他风格成熟以前的《钟楼铭》还是有着成熟柳体风格的《玄秘塔碑》《神策军碑》,遒劲之感更胜于妩媚之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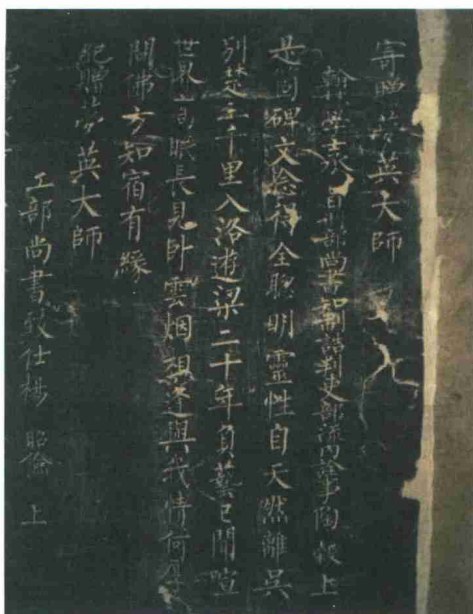
综合上述两方面,笔者认为敦煌发现的《金刚经》拓本是后人伪托柳公权之名书刻的。欧阳辅推测为宋僧梦英(948—?)、正蒙(生卒年不详)这类人所为,依据应是正蒙有《寄赠梦英大师碑》清拓本(图五、图六)传世,书法有柳字的特征,但缺少柳字的神韵,有鄙俗之感。

柳公权以书法获得皇帝恩宠,在二、三品的官位上达三十年之久。公卿大臣家为先人立碑,如果得不到柳公权亲笔所书的碑文,人们会认为是不孝的行为。甚至外国使者到唐朝进贡时都要购买他的书法。可见他的书法在晚唐书坛影响之大,况且他书写的《金刚经》石碑声名煊赫,晚唐至宋初的人学他的字体来书写这部佛经亦不足为奇。

敦煌藏经洞的文献现在可知最晚的写于宋咸平五年



图四 《大唐迴元觀鐘樓銘》



图五 《寄贈夢英大師碑》清拓本卷首



图六 《寄贈夢英大師碑》清拓本卷中

(1002年)《金刚经》拓本保存完整,纸墨如新,应是新拓不久即已放入藏经洞中。若果真是柳公权所书石碑,经历150年左右的拓印、剥蚀,碑文能保存如此之好实属罕见。可见应当是拓印前新刻不久的碑石,此又为将其断为伪作增添了证据。

注释:

- [1] 《旧唐书》卷一六五《柳公绰传附弟公权》,中华书局,第4310页。
- [2] 同[1],第4312页。
- [3] 同[1];《新唐书》卷一六三《柳公绰传附弟公权》。
- [4] (宋)赵明诚撰、金文明校正《金石录校正》,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第197、200页。
- [5] (宋)董道:《广川书跋》卷八,收入(明)毛晋辑《津逮秘书》第21册,台北艺文出版社,1966年。
- [6] 参看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编《历代碑志丛书》第一册粤雅堂丛书本《宝刻类编》八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两条记载见1-737下栏及1-738上栏。
- [7] 转引自陈龙海《柳公权书碑系年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9卷第2期,2000年3月。
- [8][9] (清)孙承泽:《庚子消夏记》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10] 笔者根据网络资源“国际敦煌项目”数据库公布的图版录文并标点。
- [11] 罗振玉:《墨林星凤·序》。1916年,罗振

玉将敦煌藏经洞中所出的三种拓本,即唐太宗李世民书《温泉铭》、欧阳询书《化度寺塔记》、柳公权书《金刚经》,收编为《墨林星凤》一卷影印行世。

- [12] 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全集》卷十四《湖南文存》卷六,东京,筑摩书房,1969-1976,第148-149页。
- [13] 欧阳辅:《集古求真》卷五,开智书局,民国十二年(1923年)。
- [14] 吴鸿清主编《中国书法全集》27《柳公权卷》,荣宝斋,1993年,第223-224页。
- [15] 饶宗颐编《法藏敦煌书苑精华》第一册《拓本碎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3页。
- [16][19] 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77页。
- [17] 倪文东《柳公权及其书法艺术论》,载《文艺研究》2003年艺术研究专辑(总第3期)。
- [18] 博文网址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372292201013bq8.html。

(责任编辑 李冠燕)